

INTEGRATION, COMPOUND AND SYMBIOSIS: ETHNOGRAPHY
NARRATION OF CENTRAL ASIAN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LT AND ROAD”

融汇、复合与共生：“一带一路”视域下中亚文学的民族志叙事



<https://doi.org/10.24412/2181-1784-2025-26-435-445>

程姗

兰州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 730000

Cheng Sh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Ph.D candidate

Lanzhou University

1043746604@qq.com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极大促进了中亚地区各个领域的相关研究。丝绸之路作为“一带一路”政策的文化基因，不仅是世界主要文化形态的孕育源头，还为沿线各国的人文交流奠定了深厚的共生根基，推动各国理解互信的同时，承载并传递了特定的政治主张、文化价值与社会意义。新时代背景下，基于“一带一路”视域，作为丝绸之路沿线关键地区的中亚，其人文领域的研究相当迫切。中亚文学的民族志叙事，是文学与人类学融汇共生基础上，了解中亚地区地理空间、历史过往、风俗习惯、民族性格、文化传统的别样路向，具有显著的研究价值。最后，“一带一路”视域下以文学为媒介的交流，跨越了地域与民族的界限，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体悟到人类情感的共通性与文化的多样性，有助于呈示全面、正面、通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内涵。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亚文学；民族志；文化交流；人类命运共同体。

Abstract: The proposal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greatly promoted relevant research in various fields in Central Asia. As the cultural gene of the "Belt and Road" policy, the Silk Road is not only the source of major cultural forms in the world, but also lays a deep symbiotic foundation for cultural exchanges among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promot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trust among countries, while carrying and conveying specific political opinions, cultural values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Belt and Road" vision, as a key area along the Silk Road, Central Asia's research in the humanities field is quite urgent. The ethnographic narration of Central Asian

literature is a different way to understand the geographical space, historical past, customs, national character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of Central Asia on the basis of the integration and symbiosis of literature and anthropology, which has significant research value. Finally, the communication with literature as the medium under the vision of "Belt and Road" has crossed the boundaries between regions and nations, and made readers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realize the commonality of human emotions and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s, which is helpful to present a comprehensive, positive and transparent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Keywords: "Belt and Road"; Central Asian literature; Ethnography; Cultural exchange;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诚如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的阐释：“我们习惯了用政治和经济的术语来描绘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但作为一个经验的问题，人和社会并不局限于权力、财产和生产，他们对经验的描绘、学习、说服和交换的关系同样是基本的。”[1]. 由此，一种以文化为路向看待与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被嵌入人文学科之中。中亚，并非单向度意义上的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区域范畴，“中央亚细亚之地，在人类文化史上，久居重要地位，它一方面是许多风俗习惯和艺术发源的中心，一方面又是上古世界一切主要文化中心间的媒介”。[2].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民族长期交融共生的社会现实，使中亚文学内蕴着广博丰厚的文化意涵，基于“一带一路”视域，以民族志叙事为研究范式，挖掘中亚文学叙事中呈现的传说、史诗、神话、风俗、民间故事、心理惯习等向度，有利于深入感知这一区域繁复多样的族群过往、文化生境、精神结构与历史传承，最终为“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地区的国家间牵系理解互信的情感链接和文化纽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何以“中亚”：丝路辐射下的中央亚细亚之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文学与地理学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逐渐成为新时代背景下的热点乃至显学。严家炎提出“文学是有地域性的”[3]，曾大兴提出文学地理学重在考察“自然、人文环境对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的影响”[4]，李怡提出地方路径，试图去突破区域、地域与“文学中国”整体经验之间的人为隔绝。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思路出发，去考察何以“中亚”，不但要立足于自然地理层面，还应关注到文化质素等人文地理向度，从而深入体察中亚文学的基因脉络。

自然地理层面，德国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最早对中亚地区进行了详细的区域界定，他认为：“中亚的地理范围西起里海，东达兴安岭，南自喜马

拉雅山，北至阿尔泰山。苏联学者认为中亚一词专指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所在地区（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5]。随着政治格局的转变与经济状况的演进，学界对“中亚”逐渐延伸出广义、狭义两种观点。

广义上的“中亚”概念，主要指“包括今位于阿富汗、中国西部、印度北部、伊朗东北部、蒙古国、巴基斯坦以及苏联在中亚地区的各加盟共和国”[6]。某种程度上，还涵盖了更为广阔的地理空间，除了包括传统认知中的中亚五国地区外，还将周边一些受中亚文化影响或与中亚有密切地缘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区域也纳入其中，这种界定更多是从文化传播、历史交流以及区域互动的宏观视角出发，强调中亚地区在欧亚大陆文化交流与融合中的重要枢纽作用。而狭义上的“中亚”是“以阿姆河及锡尔河两河流域为中心，主要包括当代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7]，严格聚焦于中亚五国。这种界定方式更侧重于从现代政治版图和国家主权的角度来明确中亚的地理范围，便于在具体的政治、经济、外交等事务中进行精准的指代和操作。总体而言，中亚地区以干旱、半干旱的气候类型为主，降水稀少，冬冷夏热，植被上又以荒漠、草原为主体。地势上，以丘陵和平原为主，沙漠面积占比较大。这一区域山脉纵横，囊括了天山、昆仑山、帕米尔山等，其中喀拉峻峰海拔高达 7546 米。

地形上，深居亚欧大陆内部，四周被山脉和高原环绕，远离海洋水汽的直接补给，使得其气候的大陆性特征极为显著。这种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不仅塑造了中亚地区独特的自然景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历史文化的发展走向。

文化质素层面，“^{中亚}区域堪称人类最古老的居住区和文明发祥地之一”[8]，

是“丝绸之路”上的主要枢纽，而^{丝绸之路}则是“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尤其是在这条路的末端部分曾经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花剌子模文明、印度河文明、中国文明等许多古代文明”[9]。由此，^{中国、古印度、阿拉伯、古埃及、古希腊等几大文明}在这块土壤上交流与碰撞，并^{造就了中亚}多民族融汇共生的独特文化。

在语言的归属和使用上，中亚地区绝大多数民族日常所广泛使用的语言^{普遍隶属于阿尔泰语系中的同一个特定语族}，这一语族内部的语言特征和结构具有显著的相似性和共通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这两个国家中的少数特定民族群体，在语言使用上却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他们并未完全遵循这一普遍的语言归属模式，而是保留了自身独特的语言传统和习惯，从而构成了这一地区语言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大部民族使用的语言可以追溯至^{回鹘文、摩尼文、婆罗米文、叙利亚文、古代突厥文、粟特文、察合台文等文字}。从诸语言的亲疏度看，哈萨克语与吉尔吉斯语相近；乌兹别

克语与维吾尔语相近；土库曼语与撒拉语相近”[10]，所以，这些语言在具体使用过程中虽有一定差异，但基本能够保证日常沟通，并最终建构了中亚地区民间文学的主体。

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这里长期抗衡相争，游牧文化和农业文化也在这里相互影响，共同繁荣。文化上，中欧十字走廊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中亚各国既有本民族的文化精魂，又是东方大陆文化、欧洲海洋文化、欧亚混合型文化的复合产物。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在这里交替更迭。所以，中亚^{各国文学长期在}融汇、复合与共生的基础上发展，彼此共享相当的文学传统、文化遗产、传统文学作品，形成了有机共同体。

由此观之，中亚及中亚文学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能指，蕴含着广阔的研究内容。然而，依据相关统计，中亚文学的相关研究极其薄弱，主要受限于国别研究的体例且研究视角单一，研究理论落后，缺乏新视角、跨学科的综合性思维。与此同时，中亚文学天然内蕴的多民族文化优势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中亚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其文学样态承载着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独特印记。这种交融不仅体现在语言、叙事结构的互渗中，更通过文学文本记录了不同文明对话的历史轨迹。由此观之，中亚文学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范畴中属于亟待深入探究的领域，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亚文学研究能够为沿线国家提供文化认同的参照系，通过解析文学中的文化符码，揭示跨地域文化互动的深层机制。这种研究视角的转换，有助于打破传统国别文学研究的壁垒，在动态的文化网络中重新定位中亚文学的坐标，进而为构建平等互惠的国际文学关系提供理论支撑。

二、“写文化”：中亚文学的民族志言说

“原初人类的社会文化都以诗性的方式表达，通过远古神话，我们完全可以认识其政治、诗性、法律、社会风俗、历史事件。也就是说，‘诗性智慧’可以达至真理的认识。所以，真实的虚构也将民族志和文学文本联结在了一起”[11]。中亚文学的体裁多样，具体而言则包括传说、神话、史诗、民间故事、宗教故事、叙事诗、辞令、民间笑话、黑萨等文类。这其中充分彰显了作家凝眸于中亚地区异彩纷呈的“地方性知识”，自发对中亚地区的地理空间、风土人情、族群过往、文化阐释和审美感知等向度进行追本溯源的生动描绘。因此，呈现出一种开阔包容的主体间性立场与走向田野的书写态度，最终映射出民族志般的文化记忆功能。

上溯至 19 世纪末，文化领域与人类学的互渗已初具雏形，诚然，这种跨学科思维有学术发展自身的内在规律，但不可忽视的是帝国主义全球殖民及其对“落后”地区原始文化进行再发现的扩张野心。“人类学关注的文化他者给

西方人的想象世界和文化价值观带来了双重的影响”[12]，以艾略特、伏尔泰、叶芝、劳伦斯、庞德、福克纳等为代表在其作品中对异国情调浓郁、异域风格鲜明、异族气质强烈的“他者”展开想象与形塑，促进了“原始”“巫术”“魔法”等文化要素得到重释，也将西方中心视域下长期被指涉为边缘的文化获得生机。20 世纪上半叶，马林诺夫斯基凭借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著书《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正式建立了科学民族志范式并将其嵌入到人类学研究方法中。显然，这一时期的人类学者作为跨文化转译者，不再沿袭 19 世纪末期主观性与个性化的表述轨迹，过去常见的对主体感受的自然摹写、对异文化想象的热情言说皆被田野调查基础上的客观性、精确性和科学性所替代，“在田野工作和文化表述中不仅避免情感的涉入，而且也避免挖掘被调查者的情感、直觉、无意识等非科学、非理性、非逻辑的主体意识”[13]。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精神世界产生了深远持久的震颤，对科学与理性的反思成为人们亟须回应的问题。以克利福德·格尔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对污染和禁忌观念的分析》、保罗·拉宾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等为代表，西方人类学家开始“把文学理解为某一特定文化的文本，并试图在方法论上发起对人类学写作问题和学科性质的重新探讨”[14]。不难看出，这种从科学分析到文化阐释的转型，充分肯定了文化景观的主观性，愈发增强了人类学对民族志体裁蕴含的文学性的理解，也促进了人类学在更加文学化的趋势中与文学形成水乳交融的局面。

中亚文学的民族志言说有着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史诗与叙事诗中《乌古斯汗传》反映了古代中亚氏族部落对族群起源、部落联盟、战争过往形成的历史记忆，并且与汉文史籍中关于突厥、回鹘的记载有一定联系。史诗中出现了光、电、树、苍狼等意象，凸显了中亚民族的原始信仰与图腾崇拜。

《先祖阔尔库特书》记述了哈萨克族常见的风俗习惯，如：祝福词（巴塔）请智者给子女取名、于箭落地处安家、打马蹄银、分享猎物、报喜要奖赏礼“看姑娘”择偶、指腹为婚等等。《阿勒帕米西》凸显了中亚地区多民族交织共生的历史文化、风土民情与宗教信仰。受制于自然环境，这一地区多为骑马打猎的游牧民族，他们逐水草而居，牧牛羊为生，是典型的草原文化类型。《阿勒帕米西》中，英雄阿勒帕米西的坐骑拜奇巴尔便是中亚史诗中比较经典的骏马形象之一。坐骑作为英雄最为重要的战斗伙伴之一，从英雄的非凡降生就会一直陪伴到他长大成人，驰骋沙场。这样的骏马形象不仅仅在

《阿勒帕米西》中，在《玛纳斯》《艾尔托什吐克》《阔布兰德》等史诗中也有所呈现。《玛纳斯》呈现了柯尔克孜族在长时间历史进程中的传承脉络、自然生态环境、游牧生产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习惯等内容。从历史维度来看，其生动展现了玛纳斯家族数代的活动轨迹与功绩，叙述了历史上柯尔克孜族民众与邪恶势力抗争，坚韧不拔、追求福祉的事迹，彰显出团结协作、奋发图强的伟大精神。从文化维度分析，《玛纳斯》中蕴含着柯尔克孜族丰富的传统习俗与文化观念。像婚礼习俗、丧葬仪式等生活场景的细致描绘，让人们能真切感受到这个民族独特的生活韵味；而其中所体现的对英雄的尊崇、对正义的坚守等价值观，更是柯尔克孜族文化精神的重要体现。从生态维度观察，它描绘了柯尔克孜族生活的草原、山林等自然环境，以及他们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展现了游牧民族在适应自然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生态智慧。自然环境层面，充分表现了中亚地区冰山巍峨、草原辽阔、沙漠寂寥的典型风光。精神信仰层面，古代柯尔克孜祭拜苍天、向天祈祷的习俗十分盛行，玛纳斯就被视为苍天之子，神力由腾格里所赐。“天空崇拜是北极、西伯利亚及中亚民族的普遍现象，崇拜的对象不是作为自然物的‘天空’，而是天神，一个正在成为隐退上帝的全能造物主”[15]。月亮崇拜也与这种观念密不可分，突厥神话体系中，天神创造的第一个人叫作 Ayata（月亮父亲），《玛纳斯》中的英雄与月亮关系紧密。

小说中，大量东干族作品基于中亚地区的风土民情与行为习惯，凭借真实的鲜活的民间传统，支撑起了“一带一路”的地理、人文、历史廊道。阿尔布都的小说无疑是对东干族风土人情百科全书式的真实展现，他的男性人物形象建构如《扁担上开花呢》中的二战英雄哈尔克、《老马富》中的集体农庄主老马富、《独木桥》中的起义军领袖白彦虎、《头一个农艺师》中的巴给，将侨民迁徙过程中在雪山荒漠间长途跋涉，与身后追兵赛跑的历史详尽言说，从迁居到被接纳，又需要百倍的努力与挣扎。所以，阿尔布都小说中男性人物的性格形塑，承载着本民族的历史过往、族群记忆和价值观念，尤其凸显出对传统英雄史诗的现代化改写，呈示出对民族精魂的询唤。他的女性人物形象建构如《扁担上开花儿》中绰号为“孙二娘”的开婕子、《不素心》中的拉彦、《头一个农艺师》中的花儿、《补丁老婆儿》中的“补丁老婆儿”《我爷的脾气》中的“我妈”以女性的穿衣打扮中戴盖头，不施脂粉，穿宽大的衣服的细节，叙述了东干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双重影响。

三、融汇共生：“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意涵启发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主要内容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16]。2019 年，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演讲时强调：“要积极架设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桥梁，深入开展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人文合作，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格局”[17]。“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现代新形式，亦是连接世界亚洲、欧洲、非洲主要板块的交流廊道。作为新时代背景下我国重大战略决策，它能够有力助推人类文明进步、世界人文领域交流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对中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向度的研究逐步深化，而作为增进情感交流与理解互信，中亚文学中的民族志叙事成为了解读中亚地区民族根性、历史文化、传统习俗、风土人情的别样路向，因而，对其展开相关研究愈发必要和迫切。

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个历史范畴，更是一个文化概念。相较于将古丝绸之路界定为古代亚洲、欧洲与非洲大陆各民族间的商贸交往史实，将其理解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鉴、理解互信，并以此共同推动文明进步，更为贴切。在当今时代，若缺失工具、种子、算数、历法、印刷术、文学、舞乐、绘画、建筑、宗教、天文、社会制度等多领域的文化交流，东方中国的盛唐气象以及开启现代文明的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恐难想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古老的丝绸之路曾经多次经历了繁荣与衰落的交替变迁。尽管其命运跌宕起伏，但无可否认的是，这条横跨亚欧大陆的商贸通道，在沟通中西交通、促进沿线各国经济贸易发展、加强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相互理解等方面，确实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丝绸之路不仅是商品交换的桥梁，更是思想、文化、技术传播的纽带，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西汉时期，随着张骞勇敢地出使西域，这一历史性的壮举极大地促进了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使得这些国家之间的互动逐渐变得频繁起来。自公元 304 年刘渊自立为汉王开始，直至公元 589 年隋朝成功实现全国的统一，在这长达近三百年的时间里，丝绸之路的繁荣与发展步入了其历史上的第一个重要阶段，这一阶段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初步交融与共同进步。随后，当蒙古帝国强势征服中亚和西亚，并最终统一中国后，海内外的交通线路变得前所未有的畅通无阻，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也随之迈入了第二个辉煌的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中西亚的各个民族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表现出了深深的倾慕之情，因此，西域地区的居民纷纷效仿中华风

俗，华化现象在这一时期变得尤为显著，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不幸的是，自元朝末年开开始，丝绸之路逐渐陷入了衰落的困境，甚至几近中断，这使得东西方各国不得不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文化交流与经济往来的密切程度大不如前，丝绸之路的辉煌也逐渐成为了历史的回忆。

因此，“一带一路”不仅肩负着古丝绸之路的历史传承，为沿线各国构建了丰富多彩的文学交流平台，推动了多元交汇的文学发展态势，而且彰显了全面、积极、深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核心要义。以文学为路向，“我们能感受到更博大丰盛的文化人的‘共同体’——‘文学共同体’，其旨归是文明交流互鉴，摒弃文化霸权主义逻辑以及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促进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以共赢取代对抗，以和平促进发展。‘文学共同体’超越了个体的狭隘私欲——中国的‘和合’文化基因正是最好的映衬，亦是沿线国家人民坚守和平的文化根基、共识愿想。”[18] 中亚文学中的民族志叙事，充分映射了不同历史时期中亚地区各族人民的情感世界与心灵史诗，也完满凸显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学、文化思想中的共通性，这为更深刻地认识、解读中亚衔接了人为的桥梁。

同时，纵观历史上丝路文化交流的过往和如今“一带一路”形塑的多元交融态势，可以发现和平是丝路繁盛的前提，也是丝路文化交流的结果。回溯历史，古丝绸之路畅通时，沿线的各民族如：汉、匈奴、突厥、契丹、羌、回鹘等自然保持着一种融汇共生的民族交融图景。此时往往为和平时期，沿线各国人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化繁荣且政经领域交流频繁。而古丝绸之路阻断时，沿线地区经济凋敝、文化隔膜，正是由战火频仍直接导致的。一定程度上，古丝绸之路衰败就是出于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及其在周边不断掀起的战争。开放性与全球化是人类文明向更高层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和平就成了必要条件。“在交流中消解差异、矛盾和冲突，在交流中自会民心相通、民心相聚”[19]，各类种族主义、极端民粹主义、极端宗教主义必然引发混乱、仇恨与冲突，严重阻碍各国正常的文化交流与和平发展，应坚决予以抵制。

此外，平等共享应当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交往相处的共同态度。人类文明的样态不胜枚举，当今世界的 2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之中，拥有约 2500 多个民族和宗教，形成了各具特色文化形态，而这其中是没有绝对的优劣或高低贵贱之分的。因此不难看出，文化的多样性特征在世界范围内将会长期存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文化霸权强权不尊重文明多样性，妄图将自己的文明奉为最优，普世性推向世界的行为必然不会被其他国家真心接纳，最终

也难离衰败的结局。辉煌的丝路文明持续千年，正是受益于平等共享的相处之道。它一再证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无论大小，无论强弱，无论制度、文化有多大的差异，都只有平等相待，才能实现良性的互动和交流，物质和文化成果也在交流中才能够实现共享。

最后，应以尊重差异，兼收并蓄的包容胸怀参与到“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中。20 世纪末期，冷战格局的终结使世界朝着全球化、多极化的大方向进行调整变革，但是，预想中和谐友爱的地球村未能如约而至，西方的霸权主义与殖民扩张思维仍然深刻影响着世界的发展。就文化领域而言，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铁幕落下后，今后的世界冲突与冲突的根源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而是由所谓“文化的差异”构成的“文明冲突”。他依据地缘与宗教将全球划定出七大文明体系，认为“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与西方文明存在明显差异，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因而属于‘挑战者文明’，文明的冲突因此就是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20]。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论”，宣称：“西方的民主自由战胜了共产主义成为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人类社会政治领域发生的一切问题都是因为没有充分实现民主自由原则而导致的，今后人类的一切努力就是要在政治上实现充分的民主自由”[21]。面对西方国家隐含冲突与对抗的价值观念，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响亮回应，向世界明确传递了崛起的中国想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积极声音。文明因交流而多彩，也因互鉴而丰富，在吸收全人类优秀文明的基础上才有了如今璀璨的东西方文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方能人类大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实施，必然促进在相互包容不同文明下的相互吸纳，也必然激发各自文化的创新发展和文明进步。

遥想当年那座繁华的长安城，来自各族乃至各国的人们，尽管他们的语言各异、生活习惯不同、肤色多样、信仰多元，却能在寒冷的冬夜围坐在温暖的炉火旁，欢声笑语，载歌载舞，共同营造出一片和谐共融的温馨景象。敦煌莫高窟的精美壁画上，生动地描绘了唐代长安居民的日常生活场景：他们品尝着通过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西域美食，这些美食香气四溢，令人垂涎；他们身着由匈奴、突厥等域外民族传统服饰改良而成的开领衣衫，这些衣衫既保留了异域风情，又融入了中原的审美，显得格外别致；他们使用着晶莹剔透的玻璃器和璀璨夺目的金银器，伴随着悠扬的胡璇乐曲，翩翩起舞，那舞姿轻盈曼妙，充满了异域的风情与韵味。这一切，无不展现出当时长安城那令人惊叹的繁华与美好，仿佛一幅流动的盛世画卷，令人心驰神

往。在一千多年后的现代中国，秉承着古老而深厚的“丝路精神”，积极而富有远见地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宏伟倡议。与此同时，中国还明确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核心价值追求和互利共赢的利益原则，旨在构建一个更加紧密、和谐的国际合作新格局。回顾历史，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已经惠及了全球各地的文明，绵延数千年之久，其影响深远而广泛。

“一带一路”倡议，无疑是对这段辉煌丝路历史的传承与延续，更是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面向未来所做出的创新性发展战略。在这一倡议中，深化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被视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和应有之义。回溯两千多年来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与民族之间的频繁交往，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只要我们始终坚守团结互信的基本原则，秉持平等互利的经济理念，展现包容互鉴的宽广胸怀，追求合作共赢的共同目标，那么，即便是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也完全有能力携手共享和平的阳光，共同迈向繁荣发展的美好未来。在这一过程中，各国必将携手创造出比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更加璀璨夺目、影响深远的文明成果，这些成果不仅将极大地丰富人类文明的宝库，更将为全人类的福祉和进步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结语

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多民族长期交融共生的社会状况，赋予了中亚文学广博而深厚的文化内涵。立足于“一带一路”视角，以民族志叙事作为研究范式，对中亚文学叙事所呈现的传说、史诗、神话、风俗、民间故事、心理惯习等维度进行挖掘，有助于深入洞察该区域复杂多样的族群过往、文化生态、精神架构与历史传承。最终，为“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地区的国家搭建理解互信的情感桥梁和文化纽带，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参考文献：

1. 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 W.M.麦高文.中亚古国史[M].张翼,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
3. 严家炎.区域文化：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视角[J].中国文化研究,1994(4).
4.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5. 周伟洲,丁景泰.丝绸之路大辞典[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6. (巴基斯坦)A.H.丹尼,(俄)V.M.马松.中亚文明史第 1 卷[M].芮传明,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7. 马大正,冯锡时.中亚五国史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8.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中亚民间文学[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
9. 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M].钟美珠,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10. 吐孙阿依吐拉克.“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亚民间文学研究——兼评《东方民间文学》[J].民间文化论坛,2021(5).
11. 叶淑媛.二十世纪以来的民族志小说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12. 叶舒宪.文学人类学的中国化过程与四重证据法——学术史的回顾及展望[J].社会科学战线,2010(6).
13. 章立明.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概述[J].民族文学研究,2010(3).
14. 王傑婷,蔡栋梁.世界主义的文学与人类学——迈向整体人类学的跨学科新话语[J].民族学刊,2022(8).
15. 周梧.分析心理学视野下的“自然崇拜”——以史诗《玛纳斯》为例[J].科学·经济·社会,2020(01).
16. 吴浩.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对中国丝绸之路研究思想史意义的考察[J].学术界,2019(3).
17. 习近平.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N].人民日报, 2019-04-27 (3) .
18. 杨刘秀子.共生、流衍与增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21(7).
19. 王薇,王玉林.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特点与当代启示[J].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2019(1).
20.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21.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